

---

## 总结分组讨论概要

主持人 加加美光行 (KAGAMI Mitsuyuki)

加加美光行教授的基调报告首先指出 5 个分组讨论大家都提出了方法论的问题。即如要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种种难题，首先要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明确其变化与变革的方向。其次随着 IT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化导致了各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对这两者间出现的新现象和相互作用，必须找到可以对其进行分析的新的方法论。

上述的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按照沟口雄三教授提出的问题意识，IT 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带来的信息全球化导致了新的变化，来自于原本在方法论上就有谬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横轴—空间轴中的大量信息流行于世并形成了对社会变化的外来压力。正如刘新教授所指出的，这种横向来的压力在内部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看看网上的论坛等就会清楚，比起理性的发言，情绪化的言论更能产生压力，使得在政治上产生民粹主义的可能性变大，不一定就能使社会得到均衡发展。

这一点也和理查德·波姆教授 (Richard Baum) 提出的作为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的反馈体系 (feedback system, input & output system) 有关。尽管这个观点在伴随着现代化出现的市民社会化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但正如刘新教授指出的那样，IT 信息技术的全球性通用化使得一般民众也有了参加“公·Public”的活动的可能，这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超越市民社会层次的史无前例的变革。这也是沟口教授和宇野教授主张的历史纵轴与外部压力的空间横轴之交错产生的传统性变革课题应该被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原因。

以上的观点反映在经济学方面与格利高里·邹教授的问题意识相关。中兼和津次教授尽管认为邹教授的观点是单纯的市场万能论，但也乐观地认为随着跨国企业的扩张，国家社会关系最终将包容经济全球化并自然朝着自律性的稳定和均衡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样的自然均衡论却容易忽略哪怕单单是外资的全球性的非自律性作用就会给自律性均衡带来很多扰乱因素等问题。

在环境问题上，定方教授认为包括无公害农产品在内的高附加值农业在全球的推广可能会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思路，其实这也可以被看成是和邹教授类似的自律性市场万能论。和邹教授持同样观点的 Lu Ding 教授也接受这个看法，认为只有将环境保护的经济活动包容进市场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定方教授还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之前公害问题的恶化将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可以利用转让或引进脱硫装置等先进的公害处理技术将公害的恶化横向稳定的隧道通道理论，而通过技术转让形成隧道通道本身当然要以拥有高科技和市场的全球化作为动力。在这一点上，定方教授对全球化在国家社会关系中起到的搅乱作用也持乐观态度。另外，榎根教授认为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随着非政

府组织环境保护团体的崛起，必须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此，我们应该构筑可以将业已形成全球网络的非政府组织等的跨国境活动安定地反馈到环境行政和企业的环境保护政策上的体系，这一点决不能忘记。

全球化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接口。但同时反过来讲也引发了民众非理性的冲动的政治意识，有可能导致民粹主义政治的倒行逆施。政治上时殷弘教授提出的对日外交新思维眼下在网上遭到了情绪化的猛烈批判，这是事实，尽管这只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但也不能认为就一定会均衡稳定地产生国家社会关系的自律性反馈机制。另外朱光磊教授认为社会发展会通过促进承担民主化主体的中产阶级的成长来实现政治改革，这也属于自然均衡论。当然在这里也避免不了民主化与全球化连动而成为导致混乱的因素的倾向，因此在自律均衡下，并不能保障民主化的进展。

文化方面主要探讨了90年代后期活跃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争问题。有学者认为这场论争与80年代为止的“文化热”相比，对政治·社会的波及程度弱，只停留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内。但是这场论争涉及到包含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多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论争也带有直接涉及全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等负面影响这个问题的性质。可以说眼下的文化论争并不是非现实观念论争，而明显是在探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全球化所起到的作用。萧功秦教授特别强调指出在新左派对现状进行的批判中存在着若干在近未来会引起社会和政治重大波动的因素。另外，与新左派对立的自由主义观点却肯定了中国现在的改革路线，乐观地认为全球化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最终将会与均衡发展协调起来。

通过贯穿各分组讨论的方法论问题，与会学者认识到了在现实中中国同时面对三个层面的课题，即：①国民一体化、即现代化的课题；②在国民一体化前提下的国际化、即现代的课题以及③在国际化的前提下全球化、即后现代的课题，并试图探讨如何解决这三个课题产生的难题。这三个层面的课题一方面是使中国混沌化（Khaos）的力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种混沌化的压力下中国似乎拥有可以保持均衡发展的能力。这种混沌化能否不（导致中国）走向崩溃，而是沿着螺旋形曲线将中国导向均衡发展，这次研讨会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在方法论上明确这种不安定性均衡（实现）的可能性正是现代中国学方法论的命题。

（刘星 译）